現代德國史學的發展和演變
—以比勒菲爾德(*Bielefeld*)學派爲例[①]

王 晴 佳*

歷史研究在德國具有悠久的傳統。十九世紀的蘭克（Ranke）學派不但在歐洲獨領風騷，也對整個西方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②] 二十世紀初年，歐洲其他國家相繼產生了不同的史學流派，蘭克學派的地位受到挑戰。即使在德國，蘭普勒希特（K. Lamprecht）等人也對蘭克學派注重政治史、外交史的傳統進行修正，轉而提倡社會史和人民史。但就總體而言，蘭克學派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仍然佔有主導地位，一次大戰前後，德國有“新蘭克學派”，仍然強調政治外交史的研究。直至二次大戰之後，纔有少數歷史學家嘗試著新的歷史研究模式，認眞地考慮改變持續幾十年的傳統。到了六十年代，隨著比勒菲爾德學派的興起，西德史學界展現新的氣象，蘭克史學的影響逐漸式微，代之以“新社會史和新政治史”等不同的流派，爭奇鬥艷。[③]

---

* 美國 Rowan 大學副教授

① 由於德國學術交流服務處（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DAAD）的慷慨資助，作者得以 1994 年冬在比勒菲爾德大學爲此專題作了短期的研究和考察，在此謹表感謝。作者也想對比勒菲爾德大學歷史與哲學系的多位教授的大力幫助，特別是呂森（J. Rüsen）教授和維勒（H. Wehl er）教授的指導和面談，表示謝意。

② 參見王晴佳“簡論朗克和朗克史學”，《歷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黃進興，《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臺北，允晨，1992）。

③ 有關德國現代史學的變化和發展，主要是二次大戰以後的西德史學的變遷，可見依格爾斯（Georg G. Iggers）教授的《政治的社會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Politics: Critical Perspectives in West German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Leamington Spa: Berg, 1985）。另外，也可見依格爾斯《歐洲史學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的第三章（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臺灣大學 [illegible]

一

要瞭解比勒菲爾德學派的興起，我們必須首先看一下德國高等教育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德國的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傳統，最老的大學如海德堡大學建於中世紀，爲歐洲最老的大學之一。在中世妃，大學的設立是爲了培養基督教教士，課程自然以神學爲主。其它的課程如哲學，包括自然哲學，和歷史、修辭、文學等，都屬於輔助課程。大學既然爲教會所辦，其結構自然便受其影響。師生關係類似行會裡的師傅與徒弟，前者對後者有很大的支配作用。事實上，大學在那時本身就是一種行會。進入近代社會以來，由於德國的長期分裂，各地自行其是，教育的改造付諸闕如。德國在1871年的統一，對大學的結構並沒有多少影響。俾斯麥建立的公務員制度，將教授視爲國家官僚制度的成員，鞏固了教授的社會地位，同時也強化了教授（Ordinarien）在學校對學生和年輕助教的控制。如果說德國在十九世紀末期仍然保留了不少封建殘餘，大學便是其根據地之一。舉例來說，德國的博士在取得學位之後，仍然需要撰寫所謂的“教授論文”（Habilitation），其課題必須不同於博士論文。一般說來，博士通常是在成爲某教授的助手之後纔開始博士論文的寫作。因此從選題到最後答辯及落實工作，其指導教授對年輕的博士有“生殺大權”。這種培養方式，造成德國教育的保守和守舊。學術自由的空氣相對其它國家來說不夠濃厚，師生關係比較拘謹。教授之間和師生之間的學術討論也受到牽制。這種情況在兩次大戰之間的魏瑪共和國時期，並無多大改變，並一直影響到今天。④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德國在十八世紀便受到啓蒙運動的影響，產生了不少著名思想家。啓蒙運動號召解放思想，改造傳統，對德國教育界的革新自然有著不少推動作用。思想家、學者如費希特、謝林、施萊爾馬赫等都呼籲教育改革。教育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教育思想更是有著深遠的

④ 有關德國大學的發展和教授地位，見 Fritz Ringer,《德國紳士的衰降》(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和 Charles E. McClelland,《德國的國家，社會和大學》(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影響。⑤ 洪堡認爲教育的目的是陶冶人心，以科學的手段來發展人的內在能力。教學和研究因此必須相互結合，以求知識的實用性和現實性。爲了開啓心智，洪堡提倡學術自由，更推崇學習和研究的自由。他認爲教育的目的在於追求眞理，而不是傳播已有的知識。作爲追求眞理的手段，研究便成爲教育的一部分，研究和教學因而取得了統一。

洪堡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想，成爲二十世紀德國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之一。二次大戰以後，德國開始全面重建，其中也包括對高等教育的改造。戰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知識分子，不滿德國舊有大學的貴族習氣，因而推動建立新型大學，落實洪堡的思想。一批新興大學應運而生，比勒菲爾德大學爲其中之一，創建於 1969 年。大學的創辦者希求建立一所溶教學與研究爲一體（Ein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的新式學校，提倡跨學科研究。通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發展，比勒菲爾德大學的確成爲一所有特色的學校，以“改革大學”（Reformuniversitat）聞名。其跨學科研究中心（Zentr um fur interdisziplinare Forschung）更是一世界著名的研究機構，訪問學者來自各國，其中有諾貝爾獎獲得者。⑥

新型大學的創建，提供了學科改造所必需的條件。年輕的、志同道合的同行能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和切磋相互關心的問題和課題。這是比勒菲爾德學派興起的基礎。如上所述，德國的資深教授在二十世紀仍然具有很大的權力，年輕人的突破並不容易。而新式大學的建立，無疑爲此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二

自然，大學內部學術氛圍的培養，只是學派成立的基礎之一。比勒菲爾

⑤ 洪堡的教育思想對中國的近代教育也有影響。蔡元培在德國留學期間，就閱讀過洪堡的教育著作。蔡對北大的改造，也與這一影響有關。見 William Duiker，《蔡元培：中國近代教育家》（Ts'ai Yuen-pei: Educator of Modern China）（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7）。

⑥ 有關比勒菲爾德大學的創建和發展，見 Peter Lundgreen 主編，《改革大學比勒菲爾德，1969-1994》（Reformuniversität Bielefeld 1969-94: Zwischen Defensive und Inovation）（Bielefeld, 1994），特別是第 11-73 頁。該校的“跨學科研究中心”成立於 1968 年，比大學的成立還要早，是德國目前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據點之一。

德學派的形成，還與德國史學本身的演變密切相連。這一演變開始於二次大戰之後，但改變的過程並不迅速，而是相當緩慢。第三帝國的崩潰，使得一些舊史家得以回歸故國，但他們並不急於檢討希特勒上臺的歷史動因。在四十至五十年代，有兩位歷史學家值得一提。第一位是席德（Theodor Schieder），爲比勒菲爾德學派創始人之一維勒教授的博士導師。不滿於蘭克學派只注重單個事件的描述，席德提倡結構史學（Strukturgeschichte）。當然，這種結構史學當時還處於相當初級的階段，只是引進了一些對行政管理機構和制度的分析，其著重點是討論思想概念（Begriffe）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儘管思想史（Begriffegeschichte）本身屬傳統史學，但席德的研究角度，是一種突破。另一位是孔茲（Werner Conze），爲海德堡大學的教授，也是後來成爲比勒菲爾德學派理論權威之一的考塞萊克（Reinhard Koselleck）的導師。與席德相同，孔茲也十分注意對思想概念的分析，以求對思想史的內容進行改造。例如孔茲及其他在海德堡的助手專門研究德國工業革命，這顯然是傳統思想史不可能研究的課題。從思想概念的影響入手，孔茲等人不但考慮俾斯麥等政治人物思想對工業革命的作用，而且將勞工領袖的思想引入歷史研究的領域。因此，從德國史學的變遷來看，席德和孔茲起到了承上啓下的作用。他們不僅培養了新一代的史學家，而且對舊史學作了從思想到方法上的改造。⑦

有趣的是，雖然席德和孔茲注重對史學的革新，他們仍然迴避對德國現代歷史產生的一個重要事件——納粹帝國——作出新的解釋。一直到1961年費歇爾（Fritz Fischer）《追求世界強權》（Grif nach der Weltmacht）的書出版之前，西德史學界只是將納粹帝國的產生作爲德國歷史的例外來看待，並不想追尋任何歷史淵源。費歇爾的寫作，主要依靠的是傳統的方法，即從政府檔案中研究事件產生的原因。與席德和孔茲相比，他可算是傳統史家。但費歇爾提出的問題，卻引起了很大的爭論。爲了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德國新一代的歷史學家不得不從新的角度對德國歷史作全方位的重新考察。“費歇

⑦ 在我對維勒教授的採訪中，維勒告訴我說他所以選席德爲師，就是因爲席德十分注重對傳統史學進行思想上的改造。考塞萊克在其論文集《未來的過去》（Futrues Past）中，也談到了孔茲對他的影響，見前言。

臺灣人文學術資料庫

爾爭論”因此成爲德國現代史學的轉折點。⑧

費歇爾的主要發現是德國在二次大戰中的擴張主義政策，並不是希特勒一人所獨創，而是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及其德國內部的社會經濟原因。易言之，德國不僅在戰前就有爭奪世界霸權的願望，而且在三十年代納粹主義得到了民衆的支持。不管是否同意費歇爾的觀點，德國史學家不得不對德國歷史和現實作一徹底的檢查，因爲儘管納粹帝國已經滅亡，但沒有人可以保證德國社會不會再支持類似的政權。⑨

“費歇爾爭論”在 1964 年西柏林召開的德國歷史年會上達到高潮，其影響極其深遠。但從社會原因上來分析，這一爭論反映了德國現代社會關係的變化。六十年代在西方是一個政治上動蕩不安的年代，青年學生受到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左翼思潮（包括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不滿社會現實，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問題，進而懷疑和挑戰傳統，包括傳統的歷史解釋，提倡社會和文化改造。比勒菲爾德等一批新型大學的建立和史學界“費歇爾爭論”的產生，都與這一社會思潮密切相連。歷史學的變遷，常常是其研究對象（社會和歷史）本身變遷的結果。

三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中，比勒菲爾德學 派的創始人之一維勒開始了他的歷史研究生涯。五十年代中期，維勒隨席德在科隆大學開始了他的研究生學習的階段。除歷史之外，他又選了社會學爲副專業，希圖從社會科學的新方法中汲取營養。席德提倡“民族史”（Volksgeschichite）對他頗有影響。席德對他的另一影響是對歷史研究理論的重視。維勒一直認爲，要想對歷史研究進行革新，必須重新思考歷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這種既提倡社會史，又推崇史學理論研究的作法，成爲以後比勒菲爾德學派的標誌之一。在研究課題

---

⑧ 有關“費歇爾爭論”的著作很多，這裡只引兩種簡便的著作：“費歇爾爭論十五年”（Die Fischer-Kontroverse-15 Jahre danach），《歷史和社會》（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第 6 卷（1980），第 403-419 頁；John A. Moses，《幻覺的政治：德國史學的費歇爾爭論》（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The Fischer Controversy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London，1975）。

⑨ 依格爾斯在《歐洲史學的新方向》一書中對此作了分析，見第 90-91 頁。

方面，維勒的興趣與當時的左傾政治社會思潮頗有關係。他的最早的研究項目是有關美帝國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成敗和俾斯麥的帝國主義外交政策的。爲了撰寫他的博士論文，維勒去了美國，在俄亥俄大學學習了一個階段。在結束學習之際，他走訪了一些學校，在伯克萊大學，他遇見了羅森伯格（Hans Rosenberg）。羅森伯格是德裔美籍教授，爲躲避希特勒的迫害，在二次大戰之初，流亡美國。戰後，羅森伯格在西德作過幾次演講，對德國的青年歷史學家有較大的影響。羅森伯格對普魯士官僚制度的研究，既運用了社會史研究的方法，又對德國近代社會作了新的解釋。他認爲，普魯士的官僚制度起到了保存了封建的殘餘，並服務於新興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作用。以後，羅森伯格又進一步指出，普魯士的社會政治結構，阻礙了民主制度充分發展，爲以後納粹政權的建立提供了條件。⑩

如果說維勒從席德那裡學到了方法論上的訓練，羅森伯格的開拓性研究，則激發了維勒研究第二帝國的興趣。1968年維勒完成教授論文之後，開始在大學教書。他的成名之作《德國第二帝國》爲他所寫的一本教材。儘管書的份量不重，據維勒說他是在再度赴美之前匆促寫成，但卻對德國近代歷史作了重新的解釋，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概念和研究方法。維勒寫作此書的出發點是要解釋納粹政權上臺的根本原因，其中包括爲什麼這一政權能掀起反猶太主義的運動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爲此，維勒對德國十九世紀的社會作了結構性的分析。與以往的歷史學家不同，維勒認爲納粹帝國的建立是當時德國歷史所產生的自然結果，並不是由於希特勒及其追隨者有什麼特別能耐的地方。與其說第三帝國是德國歷史的例外，不如說德國近代歷史本身就沿著一條特殊的道路發展（Sonderweg），其表現爲德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對維勒來說，德國資本主義造成了德國十九世紀社會經濟生活的近代化，但其社會結構仍然保留著許多封建殘餘，集中體現在俾斯麥所建立的官僚制度之中。通過這一制度，許多封建主得以參與資產階級的政權。德國的政治便成了一種“綜合政治”（Sammlungspolitik），封建“容克”與新興

⑩ 維勒的早期經歷和他追隨席德學習的過程爲他親口對我所述。羅森伯格的著作爲《官僚，紳士，集權：普魯士史1600-1815》（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00-1815）（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和《大蕭條和俾斯麥時代》（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zeit）（Berlin: W. de Gruryter, 1967）。

資產階級達成妥協，共同對付無產階級及其政治組織。因此，儘管德國工業化迅速建立，但民主制度則遲遲未能充分發展。維勒認爲，德國第二帝國時期經濟工業化和政府官僚化的奇異結合，造成了德國民主制度的薄弱，因而最終給納粹政黨上臺造成了機會。⑪

爲了證明這一"特殊道路"（Sonderweg）的論點，維勒和他的同事們對德國近代社會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研究，並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角度。比如，他們探討了德國"遲到的統一"（die verspätete Nation）的問題，認爲這種從上至下的統一，使得德國社會從未眞正經歷一場資產階級社會革命。他們也研究了德國外交政策與國家內部的內在關係，特別是從俾斯麥開始即用發動對外戰爭來解決社會內部衝突的外交傳統。這些問題的探討都圍繞這兩個中心論題：一是德國社會與政治近代化過程中的不平衡性，二是德國歷史的延續性，即第二帝國與第三國，或俾斯麥與希特勒之間的聯繫。例如，爲了闡述德國近代化的"特殊道路"，比勒菲爾德學派另一領導人物科卡（Jürgen Kocka）對德國的官僚制度作了具體的研究。他首先指出，德國第二帝國時期的公務員考試制度在白領階級中培養了一種特殊的思想意識。這一思想意識體現了德國工業化和文化傳統的特殊性。其表現爲他們對藍領工人持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耻於同後者爲伍。同時，因爲國家對其公務員提供職業保證，豐厚的退休金和足夠的物質上的支持，這些白領階級對國家權威自然相當擁護。白領階級傾向性地認爲他們之所以居於較高的社會地位是因爲他們爲公衆或國家工作，而一般的工人階級則爲個人的利益工作。這種思想意識也影響了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領階級。因此，科卡指出，德國的白領階級，或中產階級，並沒有成爲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堅力量，起到推動社會民主化的作用。相反，他們成了封建主義意識的代言人，因爲資本主義的基點是個人

⑪ 維勒教授與我面談時提到他如何在匆忙之中將他的思想整理成書的經過。有關該書的討論，見《德國第二帝國》（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Berg Publishers, 1985），導言和結論部分。幷參見 Roger Flectcher，"西德史學的發展：比勒菲爾德學派及其批評者"（Recent Developments in West German Historiography: The Bielefeld School and Its Critics），《德國研究》（German Studies Review），第7卷（1984），第457-458頁。

中心主義，而不是這種國家主義意識。⑫ 他的自然推論是，一旦國家不能保證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他們就會對政府不滿，轉而支持對外擴張，譬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戰；或者支持極端主義的政黨，如希特勒納粹之類。

除了對德國現代歷史作出新的解釋之外，比勒菲爾德學派另一顯著成就體現在歷史方法論上的革新。與蘭克學派唯心主義的研究方法相反，維勒和他的同事們不再注重在收集材料的基礎上對個別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verstehen），而是強調對歷史作整體的結構性的系統解釋。他們既吸收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wer）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s）理論，又吸收了英美歷史學家所熱衷的社會科學統計方法。他們認爲，通過對歷史材料作數理化的研究比較，他們可以建立歷史解釋的模式，將具體的歷史事實提升到理論，儘管他們不像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那樣認爲有一種理論可以解釋所有歷史。維勒他們所提出的有關德國近代歷史“特殊道路”的觀點，便是一種將歷史事實歸結成理論模式的嘗試。他們自稱，他們所要追求的是一種“歷史的社會科學（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⑬ 因此，比勒菲爾德大學歷史系不僅是德國社會史研究的發源地，該系還擁有德國唯一的歷史理論的教席，先由考塞萊克擔任，現由呂森接替。比勒菲爾德學派的這種既強調歷史的數量化分析，又注意歷史理論的研究的特點，使其成爲有別於法國年鑒學派和英美社會史家的一個有特色的新型歷史學流派。

比勒菲爾德學派歷史學家濃烈的社會責任感也使他們有別於蘭克學派追求“如實直書”（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傳統。他們認爲，歷史學家不可能寫出不偏不倚的歷史著作，他們必須表達自己的觀點。依格爾斯以“政治的社會史”來命名這一學派，恰到好處。因爲比勒菲爾德的歷史學家既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政治問題，又希圖用提供新的歷史解釋來達到政治教育

---

⑫ 見Juregen Kocka，“德國帝國的白領雇員和工業社會”（White-collar Employees and Industrial Soceity in Imperial Germany），引自依格爾斯《政治的社會史》，第113-136頁。另見 Kocka，“1914年以前德國工業化中資本主義和官僚制度”（Capitalism and Bureaucracy in German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1914），《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34卷（1981），第453-468。

⑬ 有關比勒菲爾德學派的研究方法，見維勒的《歷史作爲歷史的社會科學》（Geschichte als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Frankfurt，1973），和《歷史社會科學和歷史著述》（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t und Geschichtsschreibung）（Göttingen，1980）。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資料庫

的目的，對德國戰後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進行批判。⑭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比勒菲爾德學派在七十年代的西德史學界嶄露頭角，成爲領導史學研究新潮流的代表。他們在 1975 年編輯了定期出版的《歷史與社會》（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雜誌，現已成爲德國史學界的最重要的歷史研究刊物之一。同時，他們還編輯了不少叢書，如“批判系列”、“新科學系列”、“新史學系列”等等，各有好幾十本，在德國學術界造成很大影響。許多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維勒的《德國第二帝國》等亦被譯成多種外國文字出版。借用托馬斯·庫恩的詞彙，比勒菲爾德學派可以說在德國史學界創造了新的“範式”，成功地結束了蘭克學派的長期影響，開始了德國歷史研究的新時代。

但是，即使在其盛期，比勒菲爾德學派也不乏其批評者！其中有一些是舊一代的史學家，但主要的挑戰者則來自更年輕的一代，包括外國歷史學者。有趣的是，不少批判比勒菲爾德學派觀點的文章或書籍，經常在由比勒菲爾德歷史學家所編的雜誌或叢書中出版。不過，言詞激烈的爭論也經常發生。至八十年代末，以科卡的離去爲標誌，比勒菲爾德學派的影響開始式微。雖然維勒仍然堅守陣地，寫作不輟，但新的史學家開始提出更新穎的觀點，特別是對維勒所提出的“特殊道路”的觀點產生了不同看法。關於這些，只能容待以後討論了。

從比勒菲爾德學派的興起我們不僅可以看出史學研究與社會思潮的聯繫，也可了解德國戰後一代的歷史意識和他們對過去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比勒菲爾德學派對德國近代化過程的歷史思考，對我們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演變，有著明顯的借鑒意義。他們對德國十九和二十世社會現狀的分析，也對我們認識歷史在現代社會的功用有參考價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⑭ 見依格爾斯的導言（Introduction），《政治的社會史》，第 1-48 頁。